

92
K257
4
1980-89/2
➤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1980—1989年论文选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B 811435

责任编辑：徐德欢

封面设计：王 乔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1980—1989年论文集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4.25印张 6插页 85.7万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16—00775—1

K·99 定价：17.00元

谨以此书献给辛亥革命80周年!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代前言)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阔，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得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

要总结这十年辛亥革命研究的繁荣景况，必须首先探讨带来这十年繁荣的原因或曰前提条件，这一点对于保证今后研究的发展势头，显然十分重要。概而言之，除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并认真提倡贯彻“双百”方针这一根本的前提之外，就史学工作者本身和历史学科方面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中辛亥革命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事实证明，我们的史学家不乏胆识，在刚开始拨乱反正的1977年，就有樊百川发表于《历史研究》的

2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李润苍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等文章，对于歪曲辛亥革命历史、将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纳入所谓“儒法斗争”体系、蹂躏史学客观性的作法，进行了若干初步的清理批判。1979年，章开沅在《华中师院学报》发表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首先对于所谓“立足于批”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展开批评，认为应该区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区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这样才能使辛亥革命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作者还强调，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打破被认为无所不在的“路线斗争”框框，实事求是地分析人物功过。对于以孙中山和兴中会为“正统”而产生的对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偏见、因批判当代修正主义而累及清末立宪派以及不作分析地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所有外国人一概表示疑忌等不科学的观点和结论，都应重新加以研究。这些文章刊出后引起较大反响，众多研究者摆脱了极“左”思潮的束缚和影响，辛亥革命研究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其二，开放心态下的学术交流，既开扩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其原先的研究也因借鉴和争论而得到了深化。1981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44名外籍和港澳地区学者参加，他们的选题、论证和结论，有不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其后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亦是如此。还有诸如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韦慕廷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等有关著作中译本的问世，以及台湾大批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著作、论文和史料的引进，使我们的研究者既必须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挑战，通过深化自己的研究来作出回应，同时也从他人的研究中得到某些借鉴。刘大年的《赤门谈史录》就是在日本讲学的产物，其中《论辛

亥革命的性质》就是回答日本一些史学家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观点的。章开沅在80年代初写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和《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两文,以丰富的史实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及其与辛亥革命的联系,当时被学者们视为力作。而这两篇文章也可以说是回答西方某些史学家的“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台北学者的“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的观点的。尤须提出的是,我们学者的这些文章都是有理有据的学术讨论,远非十年动乱中的“大批判”文章可同日而语,他们与不同观点的学者平等讨论,并表示也从对方学习到了某些东西。

其三,进入8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祖国统一的重大课题,一直引发着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关注,并由此作出逆向考察;而在辛亥革命史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着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经验教训足资我们总结借鉴。这一现象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也反映了史学工作者极为可贵的责任感。确实,辛亥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广大工农群众追求祖国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崇高理想目标,他们奋发图强的进取心和献身精神,他们所作出的多方面努力和探求,甚至包括他们的失误和挫折,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我国人民极为珍贵的一份精神遗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此有不少共同语言。这无疑也是辛亥革命研究常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其四,重要史料的大量出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原始材料。重要文集如《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黄兴集》、《宋教仁集》、《章太炎全集》、《秦力山集》、《陈天华集》、《陶成章史料》、《徐锡麟史料》的出版,重要文献如《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一些专题资料如盛宣怀有关档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末海军史料》,还有《拒俄运动史料》、《萍浏醴起义资

4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料汇编》以及各省市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的陆续印行，还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中译本问世，以及《革命逸史》、《辛亥革命真史》和《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重印，其份量大大超过1949年到1978年所出版的同类资料，使得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可以说，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前提条件，再加上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这十年的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

二

十年间辛亥革命研究成果迭出，最令人注目的是将近百种，字数均在20万言以上的有关学术著作的出版。

8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三种全面描述和分析辛亥革命史的大型学术著作。其一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1），其二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两册，中华书局，1981—1982），其三是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全书四卷，1980年已出第一卷，1986年出第二卷）。这三种学术著作都以“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为总体把握的指导，但在内容和布局上又各具特色。

《辛亥革命史》主线鲜明而又兼顾全局，即首先着力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初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主要展示这一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埋葬中国封建帝制的功绩，也明确指出其局限性。在此同时，又全方位地关注与这一革命有关的国内外环境、事变、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与动向，诸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反抗斗争、清政府的举措和立宪派的作为、帝国主义国

家的在华利益和各自的侵略干涉方式等等。从而充分展示了辛亥前后各个阶级、阶层、派别的状况及相互关系，再现了当时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该书反映的不仅是辛亥革命这一运动的历史，而且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历史。

《辛亥革命史》的理论色彩突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征、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标准、有关政党和团体的性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地位等等重大问题，都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有意针对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从正面展开自己的分析，确立自己的论点。通过史料、理论、逻辑三者的高度结合，不仅告诉读者这段历史的真相，而且更深入地说明了造成这种真相的本质因素。此外，该书在资料的蒐求和辨析上亦付出了巨大努力，征引所及的中外史料达590多种，因而不仅为该书构筑了信史的可靠基础，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线索。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册从清王朝的衰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写起，到临时政府北迁结束，绝大部分的时间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结束相重合。该书为避免与清史、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雷同，在布局谋篇上颇突出“新陈代谢”的意理，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置于旧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外来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展开分析，因而对革命势力的对立面予以较为足够的关注，但仍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同盟会的活动斗争作为重心所在。该书认为，20世纪初年其他群众的自发斗争已让位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因而与革命派有关的就详写，无关的就略写。全书脉络清晰，结构合理，虽然重在政治举措和武装斗争，但也兼及经济、外交乃至学术文化。该书所据史料丰富，包括较多的未刊档案材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广泛吸收了已公开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并附带反映争论，表明编者的基本看法，尤其是评价人物时把握比较准确且能秉笔直书。

6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辛亥革命史稿》已出版的两卷写至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失败。该书意在考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即把政治内容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作为主要线索，同时对知识界的情况予以较多注意，诸如当时的思潮学说、报刊杂志等均有系统介绍。对于经济生活、中外关系、人民群众的抗争、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动向等，则作为革命运动的背景或与主要线索相关的因素加以考察分析。该书对具体的重大事件有较为翔实生动的铺叙，运用报刊等新闻史料较多。分析评论要言不繁，颇能激发读者的思考。

以上三书是这十年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它们填补了这一重要专题史的空白，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还须突出介绍的两本书是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和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前书考察了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指出它是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的总爆发，其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则充当了领导者。该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后书在深入分析了湖北的区域性背景之后，叙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建立、演变和发展，并着重介绍了首义的战斗经过、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和建制、阳夏战争、停战议和及这场革命在湖北的失败。作者不仅努力从首义的猝发中发掘其必然性的因素，尤其高度评价了革命党人和士兵在首义之前的埋头实干和首义过程中的创举，也不讳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湖北革命党人的幼稚。由于作者的深入调查和广泛蒐求，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因而能将一些众说纷纭的起事和战斗过程叙述得先后井然，澄清了一些争论和讹误。

此外，《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填补了此前的一个重大空白，以丰富的内容证明了辛亥革命远远不是汉族人反满族的种族

斗争，论述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辛亥革命在湖北》、《贵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河南》、《辛亥革命在山西》、《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在新疆》等书，对20世纪初年各省的社会状况、资产阶级政团的活动和武装斗争、各省军政府的建立和特点，作了较细致深入的介绍和分析，既充分说明了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展示了这一革命在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的不平衡。这些篇幅不等的专著的水平，显然大大超出了80年代以前以类似题目而写出的单篇文章。

以上是关于以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成果的介绍评说，下面还要谈谈对于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研究的进展。

重视人物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70年代末以前的辛亥人物研究，颇呈畸轻畸重的态势，即是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人物少；研究一两位领袖人物多，研究群体和相关环境少；研究人物的政治方面多，研究人物的经济、文化方面少。因此，不仅历史的丰富多样性难以显现，即使是对具体人物而言也很难说是做到了全面认识和公允评判。

十年间的变化发展令人欣慰。以年谱、传记、评传、研究一类形式出现的有关辛亥人物专著，已达80种之多。对孙中山的研究仍居领先地位，专书已达10本以上。此中《孙中山传》在同类书中最先问世，起到了前车先路的示范作用。在其后的同类著作中，《孙中山论》以其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深入考察、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系统分析，而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他有关著作则分别在探讨孙中山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与其他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作了纵深的发掘和横向的比较。对孙中山研究的优势的保持，充分说明了学术界对这位伟大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丰富思想的重视。对其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等的研究，也在持续发展

8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之中，一般都有一至两本专著问世。

进展较大的是对章太炎的研究，十年中已出版年谱、传记、思想研究等共六本。虽然人物的一生所跨时间较长，但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仍是各书的重点所在。这些著作除了回答争论已久的章太炎的反满思想问题、政治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章太炎于辛亥革命的功过问题之外，更开扩研究思路，对章太炎的学术文化思想（包括哲学、佛学、史学、经学、诸子学、语言文字学等）加以深入研究，剖析了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并力图公允全面地评估他在思想文化上的努力和建树。章太炎研究一度成为“热门”，既是因为这位思想庞杂、学识渊博的人在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也与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从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研究队伍向文化史研究的推进。与章太炎研究情况类似的是对蔡元培的研究，已出版有关著作七本，不过所论及的内容更多地超出了辛亥革命的范围。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对张謇、袁世凯、黎元洪、蔡锷的研究的进展。

张謇是江浙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物之一，清末立宪派的著名代表，他的实业活动和教育活动也很具特色。近来的研究涉及张謇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政治思想与活动、经济思想和实业建树、教育思想和实绩等诸多方面。与70年代以前视张謇为官僚资产阶级代表、政治上是袁世凯的“帮凶”的基本否定倾向相比，近几年的研究多认为张謇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且主张对其经济主张、实业和教育活动与政治态度作分别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武昌首义后张謇从主张立宪到赞成共和的转变，也不应视作政治投机，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从总体上看，张謇也属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

对于袁世凯和黎元洪的研究，明显地克服了绝对化、脸谱化的倾向，不仅重视这类人物得以形成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深

入分析他们个人的性格、才具、手段和集团的因素，以缜密的论事说理代替了简单的定性批判。还有研究者对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期的某些变革活动，对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活动，以及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对推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作用，提出了若干正面的评价。当然这些观点还未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对蔡锷的研究，不光是注意他在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时的作用，还更多地深入讨论了他与各派政治势力、各派代表人物的关系，对蔡锷到底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除了上述主要的和重要的人物之外，十年来对盛宣怀、陈其美、陈去病、蒋翊武、唐绍仪等人的研究，也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过热点，取得了若干进展。

这十年的辛亥人物研究，不再只是集中在一两个或者几个人物，而是研究和介绍了一大群人物，可说是有主有次、有反有正，构成了一组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而且对于有关人物，不再是“神化”或“丑化”的盲目溢美或简单否定，而是加以深入具体的考察分析。不再是只局限于人物的政治表现，而是全盘考察其有关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众多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注意从经济动因和阶级利益入手分析人物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不是简单地把人物看成经济法则或有关规律牵制操纵下的木偶，诸如学术文化的熏陶、人际关系的影响、世局国情所提供的环境条件乃至具体个人的性格品质、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心态变化等等，都在研究者的考察范围之内。因而史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那么单薄和苍白，他们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社会效应、表现于外部的语言行动和内心世界，都渐渐被人们所认识。

三

同资料、著作出版的情况相比较，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论文，更多得难以确切统计。大致的情況是：1980年176篇，1981年1224篇，1982年593篇，1983年432篇，1984年398篇，1985年420篇，1986年614篇，1987年672篇，1988年368篇，1989年350篇（此数字主要依据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办的《通讯》所载历年论文目录），总计5200篇左右，数量上是1949—1979那30年的10倍。

对这5000余篇论文的题目和作者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对孙中山的研究仍然占了20%左右的重大比例，但多数论文不再停留于铺叙史事的格局和方法，而是加强了对孙中山的思想，诸如工业化思想、经济理论、政治改革方案、利用外资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主张、重视人才的思想、法治思想、地方政权建设思想的研讨；不再是孤立静止地研究孙中山个人，而是加强了孙中山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孙中山与国内外各种类型的人的联系的研究，加强了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前进的研究。所以文章虽多，却少有雷同。孙中山思想的丰富性与开放特征、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越来越被人们了解和珍视。对其他人物研究的范围也在迅速扩大，表现为在文章题目上出现的人物就超过了200个。其二，在5000余篇论文中，讨论政治史、群众斗争史、武装革命史的文章仍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中外关系、社会风俗、妇女状况的研究更有显著的加强。其三，论文作者队伍壮大，其中既有老一辈的知名专家学者，但更多的是70年代末期开始陆续涌现出来的中青年研究者，他们有的目光敏锐，善于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有的具有较广博的其他学科知识和理论基础，敢于大胆探索。由此体现了辛亥革命研究这一事业的繁荣兴旺。

以上是分析论文目录即可获致的印象和感受。要全面剖析这为数众多的论文的内容、特点或将其综合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将其概括为若干重要问题，对每一问题归纳出几种讨论意见，则又有不少研究者已作过这样的工作，所以下面只打算将这些论文与1949到1979年30年间的论文从研究趋向、思考深度和方法更新几个方面作一些比较，由此发现这十年的研究论文的新特点和巨大进步。

第一是因研究者视角转换而出现的研究趋向的多样化。如前所说，从专门研究几个人物发展到研究数十乃至上百个人物，从偏重研究政治发展到全方位的社会整体研究，这里既有量的增加、有原有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有质的变化，有全新领域的开拓。这在论文中的表现尤其明显。如在思想方面，对孙中山、宋教仁、张謇等有关人士的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在经济领域中对买办资产阶级、对商人社团、尤其是对天津、苏州、上海等几个城市商会的研究；涉及中外关系的如对海关、对租界、对若干通商口岸的研究；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思潮方面，对教会学校的研究，对辛亥时期传统文化派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和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这些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这十年中才真正提出和着手进行。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80年代的现代化建设、开放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所持有的社会责任感，力图从历史和国情中发掘有关依据和经验教训，同时又反过来加深了人们对有关历史的认识。如对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孙中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眼光远大的现代化蓝图的设计师，后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若干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某些同时代人也曾经有过思考。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对以国粹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的研究，则把人们的思路从是否反孔、反封建的纠结中引导到一个

范围更广阔的、即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的必然状况之下如何兼顾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如何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重建民族新文化的重大课题的思考中去。其他如对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对商人社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也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层和复杂性格。对教会学校、海关、租界和通商口岸的研究，则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且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和部分特征。

第二是因研究者解放思想而带来的讨论的深化。十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范围遍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革命的性质与反满问题、孙中山等人物的历史作用和思想分析、资产阶级问题、革命团体问题、人民群众（工人、农民、会党等）问题、新军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立宪派和立宪运动问题、清末新政问题、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问题、南京临时政府问题、南北议和問題、中外关系问题、社会思潮和社会风俗、妇女、教育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十年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突破。但比较明显的深化可以说是体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作用的研究，对革命团体的研究，对立宪派和立宪运动的研究，对孙中山让位和袁世凯上台的研究这四个有关问题上。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辛亥革命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前30年的研究，集中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状况、少数几个工商界人士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上，因而若干结论难免给人带有理论演绎、缺乏全面而具体的实证基础的感觉。这种情况在70年代遇到了来自外部的挑战。辛亥革命之前是否只在沿海沿江几个工商业大埠中才有零星的工商业人士出现，而根本还未形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带着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或从行业入手，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采矿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作细致考察；或从区域和城市着眼，分析有关地区的经济成分。这些研究所得出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虽

不一致，但以为最迟者亦承认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业已产生，当然在是否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上各地情况颇有差别。有些研究依据大量资料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初十年已有全面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扩展了原有的行业，并建立了新行业，在较大的地区内形成了改造旧手工业和建立新式手工工厂的浪潮，新式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成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阶级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物质的经济的初步基础。研究上海和江浙地区的结果，证明这里确已形成民族资本家阶级，他们已具备“独立的阶级意识”，通过商会、商团和其他团体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还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对武汉、广东、湖南、河南、云南、辽宁乃至内蒙古等地工商业情况的考察，也得出了程度不同但倾向一致的结论。在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方面也有一些探讨，有的研究者认为，“软弱性”、“妥协性”作为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的一贯的评价是不错的，但当它处于上升时期时，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可说是其阶级性格中的主要方面。还有很多研究者依据马克思关于资产者本身与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论述，结合中国实际讨论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状况，强调阶级的政治代表必然远比阶级主体本身成熟和先进，并指出这一点乃是讨论辛亥革命性质时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

对革命团体的研究涉及到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光复会、中部同盟会、贵州自治学社以及军国民教育会、岳王会、龙华会等组织，对若干习以为常、几成定论的观点，都作了新的审视，展开了一些讨论。例如，一般都认为兴中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现在却有人提出辅仁文社不仅略早于兴中会，而且同样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性质。长期以来人们对称兴中会以誓词的形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深信不疑；现在却陆续有人对这几句誓词的出现时间提出质

14 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代前言）

疑。还有，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而成，还是由各个革命团体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组成？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较为严密的革命团体、抑或是有关团体的“革命大联合”？共进会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是否是一种错误？是否能因其会党色彩较浓、且领导成员多出身于非劳动者之家就可以认为其革命性逊于文学社？1910年重建的光复会是否与前期光复会旨趣大异、陷入了“分裂主义”？中部同盟会是否既起了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包含有“分离主义倾向”？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如何？有关争论虽不可能形成共识，但通过实事求是的平等商榷，毕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团体的了解。此外，对于军国民教育会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对于岳王会的详细情况的探讨、对《龙华会章程》的考订，都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

对于立宪派和立宪运动的研究，在前30年是非常不够的，略有论及也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这十年的研究则十分活跃。围绕着立宪派的阶级基础，就有“地主——资产阶级”（或说“大资产者、官僚、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加上“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官绅”、“上层资产阶级”直至“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看法。对于立宪派与革命派及清政府的关系，前30年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立宪派要求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因而与革命派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派附和革命，目的是为攫取领导权，以便阻止革命向前发展。而在这十年的研究中则有人提出，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彼此的基本利益一致，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属于和平竞争的性质；而立宪派与清政府虽然在抵制革命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二者却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为立宪派要用改良方式来实现确立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这与清王朝